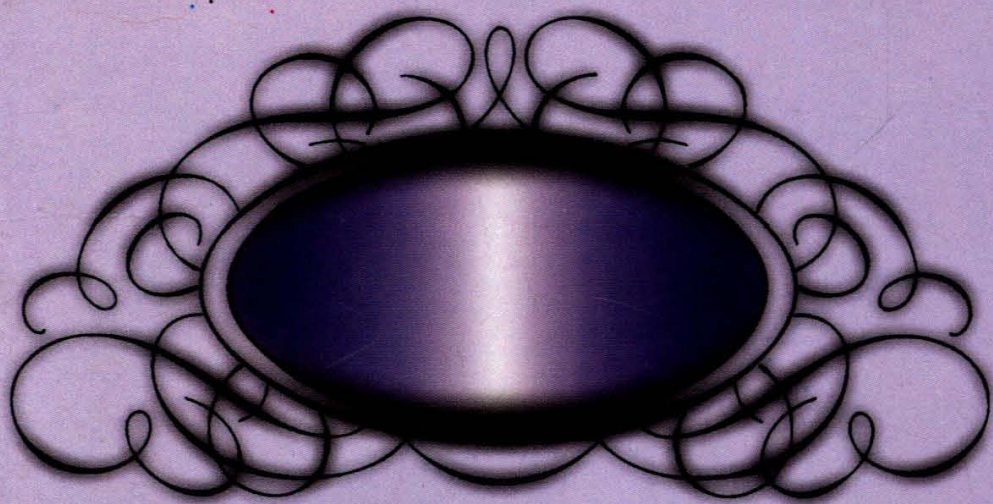




中国财政史纲

黄天华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CAIZHENG SHIGANG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中国财政史纲

ZHONGGUO CAIZHENG SHIGANG

黄天华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财政史纲

ZHONGGUO CAIZHENG SHIGANG

黄天华 编著

特约编辑 徐永禄

责任编辑 张小忠

封面设计 周卫民

出发	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装	订	上海浦江装订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81049-249-7/F·201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中国财政史纲》是一本研究中国财政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专业财经史教材。本书的编著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注重广泛地搜集史料，博采众长，并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税收的方针、政策、制度作了较为翔实的分析和论述，以求揭示财政发展和演变的一般规律性。第二，本书坚持将特定的历史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综合的考察与研究，同时也借以反映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财政税收的概貌。第三，本书在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基础上，逻辑地阐明中国财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变化，阐明历代王朝财政税收的方针、政策、法令和制度及其利弊得失，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力求观点正确，结构严谨，内容翔实，融科学性和知识性为一体，融专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国情教育为一体。第四，本书的语言文字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尽量避免引用文言典籍，对重要的史料注明出处以供读者查阅参考，对有关财政税收的统计资料，尽可能绘制成图表，以便读者一目了然，并可加以比较研究。

本书在结构安排上，采用断代史的写作方法，把社会制度、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相类似或相接近的，归并在一章，在此基础上充分地展开论述。本书同时以财税历史发展为经线，以财税制度的演变为纬线，结合当时的财税活动，突出各历史时期财税发展的特征及其承上启下的历史端点，力图将内容和范围扩展到各历史时期

的政治、经济、财政制度,财政收支、财政管理,以求揭示财政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

本书力求运用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典籍,勾勒出中国古代财政税收发展的基本轮廓,介绍税种的起源、税系的形成和财税法令制度的演变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历史的启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行财税政策和财税制度内涵的理解。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中国财政税收发展的历史,对中国财税史上的功过得失加以评述,吸取前人在财政制度、财政方针、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天的财税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原始财政	(1)
第一节 有关财政起源的争论	(1)
第二节 公共权力与财政主体	(3)
第三节 一般经济分配与财政起源	(5)
第四节 原始财政	(11)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	(19)
第一节 我国的奴隶制财政	(19)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收入	(29)
第三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支出	(38)
第四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管理	(42)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	(47)
第一节 概述	(47)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收入	(56)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支出	(60)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管理	(65)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财政	(69)

第一节	封建国家财政简述	(69)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财政概述	(74)
第三节	秦代财政	(79)
第四节	汉代的财政收入	(87)
第五节	汉代的财政支出	(106)
第六节	秦汉时期的财政管理	(118)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	(124)
第一节	概述	(12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收入	(131)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支出	(149)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管理	(155)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财政	(157)
第一节	概述	(157)
第二节	隋代的财政	(164)
第三节	唐代的财政收入	(171)
第四节	唐代的财政支出	(193)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财政管理	(200)
第六节	五代十国时期的财政	(203)
第七章	宋、辽、金时期的财政	(209)
第一节	概述	(209)
第二节	宋代的财政收入	(219)
第三节	宋代的财政支出	(235)
第四节	宋代的财政管理	(241)
第五节	辽、金时期的财政	(244)

第八章 元代财政	(248)
第一节 概述.....	(248)
第二节 元代的财政收入.....	(254)
第三节 元代的财政支出.....	(265)
第四节 元代的财政管理.....	(270)
第九章 明代财政	(274)
第一节 概述.....	(274)
第二节 明代的财政收入.....	(281)
第三节 明代的财政支出.....	(296)
第四节 明代的财政管理.....	(304)
第十章 清代前期的财政	(309)
第一节 概述.....	(309)
第二节 清前期的财政收入.....	(315)
第三节 清前期的财政支出.....	(327)
第四节 清前期的财政管理.....	(334)
第十一章 清代后期的财政	(337)
第一节 概述.....	(337)
第二节 清后期的财政收入.....	(343)
第三节 清后期的财政支出.....	(363)
第四节 清后期的财政管理.....	(369)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财政.....	(370)
第十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	(375)
第一节 概述.....	(375)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	(380)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财政支出·····	(402)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财政管理·····	(405)
第十三章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财政 ·····	(408)
第一节	概述·····	(408)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上)·····	(416)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中)·····	(431)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下)·····	(442)
第五节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支出·····	(449)
第六节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管理·····	(454)
后 记	·····	(459)

第一章 原始财政

第一节 有关财政起源的争论

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具体地研究这一范畴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是我国财政史学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学术界对财政起源问题的讨论十分活跃,归纳一下,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国家分配论

这种观点认为,原始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财政关系,因为财政与国家有着本质的联系。只是在国家诞生后,为了维持其存在,并执行它的职能,就必须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从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占去一定的份额,于是就有了财政。无疑,财政的产生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经济条件,即有了剩余产品,二是政治条件,即国家的存在。仅仅有经济条件还不足以产生财政,而国家的出现才使财政有了必然性。因此,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的。

二、社会共同需要论

这种观点认为,财政是社会共同需要的产物,当人类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发生了社会共同需要的时候就产生了财政。财政表现

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人力、物力、财力所进行的集中性的分配活动,因此财政产生的时间要比国家的出现早得多。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社会共同需要就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如公社的防卫性设施、公共祭祀、公共仓库、公共集会场所等,已形成了财政的雏形,到了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阶段,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已从社会产品的一般分配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完整的财政分配关系。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社会共同需要是财政产生的基本条件,而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财政则表现为满足国家的公共需要所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但是财政的产生并不取决于国家,财政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而国家体现的则是政治关系,属于上层建筑,国家不可能产生财政。恰恰相反,财政则为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三、经济条件决定论

这种观点认为,财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它的产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国家和财政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两种社会现象,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如果认为财政的产生是由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条件决定的,势必在理论上导致政治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唯心史观。

四、剩余产品分配论

这一观点认为,财政活动自始至终是剩余产品的分配活动,财政关系就是剩余产品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分配关系。剩余产品是直接导致财政分配从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出来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从社会发展过程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后,社

会占有剩余产品的历史过程和占有方式,就是财政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上述关于财政起源的争论,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这对中国财政史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本书则倾向于“同步论”——财政的起源与公共权力的发展,两者是同步的,即具有同一性。其理由见下面的论述。

第二节 公共权力与财政主体

一、财政起源与公共权力

财政是一个分配问题,而决定财政起源的根本原因则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换言之,财政之根源是经济关系,是生产方式,而决不是其他什么。

然而,财政从本质上又表现为公共权力(特别是国家)集中性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以满足社会各个方面需求而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的出现,就是以国家财政的面貌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因此,如果把国家当作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标志,那么只是在它诞生之后,财政才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从一般经济分配中完全独立(或者分离)出来,并以国家集中性收支形式出现的。

财政之本质特征,即为财政分配区别于一般经济分配的强制性。强制性是财政形态发展的特殊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强制性基于公共权力,没有公共权力就无所谓强制性,因此,它是研究财政起源的一个重要依据。

显然,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发展的高级形态是财政分配得以从一般经济分配中独立(或分离)出来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一独立(或分离)的过程,无疑就是财政起源的过程,我们把它称为原始财政就更为确切。

财政之根源是经济关系,财政之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集中性收支,财政之特征是基于公共权力的强制性,这是研究原始财政的出发点。

因此,论述财政起源的运动过程即为: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性因素→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性分配→一般经济分配与强制性分配(即财政分配)的分离,国家财政形成,与此相适应的是公共权力的运动过程即为:一般公共权威(前氏族社会)→氏族民主政治(母系氏族社会)→家长制(父系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或王权政治(农村公社时期)→国家政治(阶级社会)。财政形态的运动过程与公共权力的运动过程是同步的,当财政分配还融合于一般经济分配之中时,就如同十月怀胎,而公共权力的高级形态→国家,正是它的助产婆,这就是财政起源与公共权力的辩证关系。

二、财政起源与财政主体

财政的主体是什么?一般的观点认为是国家,只能是国家,根本不存在非国家财政的一般分配关系。他们认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因而也就没有财政关系。的确,财政来到世间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财政的面貌出现,参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同时财政分配的强制性,也正是基于国家实体,基于政治权力。反过来,财政分配又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作为一般推广和普及财政科学知识是可行的,但是作为专业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也是辩证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就是它的共同性、凝聚性和集体性。自有人类社会就有公共权力,其差异只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公共权力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一个有组织而无公共权力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以原始社会发展而言,原始群体(前氏族社会)时期,存在着公共权威;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公共权威演变成氏族民

主制；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则演变成了家长制；到了农村公社时期，则表现为军事民主制或王权政治；进入文明社会后，则是国家强权政治。所以如果仅仅认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那么不仅无法对财政主体的发展历史作出科学的逻辑的说明，而且也无法对财政的起源和其他一些财政基本理论作出合理的辩证的解释。

第三节 一般经济分配与财政起源

要揭示财政形态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探索原始财政的演变及其向国家财政过渡的理论问题时，不仅要追溯公共权力的运动过程，同时还要追溯一般经济分配（融合财政分配）的运动过程。因此研究原始财政就必须深入到原始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分析其经济活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一般经济分配和公共权力的特定状况，进行逻辑的综合研究。

原始社会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群时期、氏族公社时期和农村公社时期。下面分三个阶段阐明财政从原生形态到独立范畴的演变过程。

一、一般经济分配的起源

人类的童年，原始群时期，其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一个群体就是一个社会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是一个消费单位，它集社会、生产、消费于一体。早期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一些相当简陋粗劣的打制石器和棍棒，群居在沿河傍水的台阶地上，并随着生产条件和季节转换而不断迁移。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又十分匮乏，征服大自然的能力就十分有限，主要依靠索取天然动植物为生。

原始群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说明，人类自诞生之初，就具备了社会性，每一个人都必须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才不致于为

大自然所吞噬,所以单个的人是不存在的,离开了社会,个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类的社会性概念恰恰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概念。

人类的社会性说明了人类生存机制是有组织的,无论这一组织层次是如何低下,如何脆弱,如何单一,但它们是有机统一体,彼此是相互协调的。历史已证明,它们确实卓有成效地指挥、组织、管理和协调了原始群体的生产斗争和经济生活,以形成足够的生产力,维持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一个有组织的生存机制以及该历史时代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社会管理,没有权威的存在能运行吗?自有人类社会,就有公共权威。权威产生于何处?在原始人群的心目中,权威来自神灵——原始宗教的启蒙,权威来自祖先——祖先崇拜的启蒙。人类的生存需要权威,显然这权威是强有力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公共权力萌发公共权威,公共权威的起源与一般经济分配的起源是同步的。

原始群时期的生产关系是共同劳动,自然分工(按年龄、性别分工),简单协作,有限的劳动产品归集体所有。按民族学提供的资料,其分配方式首先是扣除简单储备部分,然后平均分配,共同消费。马克思认为,“共同的产品,除了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①显然,这扣除的部分绝不是剩余产品,在原始群时期也不可能存在剩余产品,那么这一分配方式存在的原因何在,其特点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它的自然调节功能,即如何分配有限的产品以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竞争,其分配的公共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一分配方式既受到生存机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群体道德观念、原始信仰等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分配关系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9页。

最原始、最一般的经济分配。

原始群时期的生产过程十分简单,其特点就是从手到口,但是生产过程的简单并不等于分配过程的简单。社会再生产的基点就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每日的劳动是否有收获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因此,分配中的自然调节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今天的劳动有了收获就储备一点,明天没有就分配储备之物;春秋季节劳动有产品,就储备一点,在严寒的冬季用于分配。原始人群生活的艰难性就在于繁重而危险的体力劳动所获取的不是等量的劳动产品。正因为如此,其特殊的分配方式就是赖以生存的方式。如果没有扣除(简单储备)就谈不上生存,更没有再生产。

正是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在原始的简单的一般经济分配中就已包含了强制性因素,尽管这是早期人类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如此分配。因此,无论这一融合于一般经济分配中的强制,是自然生存强制,还是人为法定强制,或者兼而有之,最重要的是存在强制。生存自发地产生权威、这就是一般经济分配中强制性因素的起源,虽然它还不是财政问题,但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制性因素自然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可以确认,从自然生存强制到国家法定强制,其运动轨迹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规律性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一般经济分配的发展

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生存竞争和生存斗争,丰富了生产实践,提高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劳动工具不断得到改进,生产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同时原始群体转而趋向同一集团内部禁止通婚,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姻)制度,于是氏族公社形成了。

氏族公社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专家研究表明,原始群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每10万年提高1%,而氏族公社时期则每

100年就提高1%。氏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工具有了实质性的改进,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增长和生产领域扩大,按年龄和性别实行的自然分工迅速推广,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和原始动物饲养业纷纷出现于氏族公社时期。

由于生产地域的扩大和管理活动的需要,母系氏族集团不断地分化出女儿氏族集团。对氏族集团来说,经过一段时期后,人口就相对减少,而生产力却不断地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不仅是可能,而且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在这一时期(原始社会主要时期)中,剩余产品只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一事物的出现,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母系氏族集团的分化,使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氏族是一个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但它不是一个社会,而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单位,氏族集合而成胞族,胞族集合而成部落。一般来说,部落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已不是单一垂直型的,而是多层次立体型的,由此直接造成了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管理活动相分离。这一分离意味着管理部门趋向扩大,公共权力由一般公共权威趋向氏族民主政治,而且权力中心日趋强化。

氏族本身就是集政治、军事、经济和信仰为一体的集团,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氏族公社的公共权力不仅是上古祖先与当时人类的媒介,同时也是人与神灵的媒介,权力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另外,氏族社会的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权威,马克思认为“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①因此,氏族公共权力的威严,在祖先和神灵的光环下,更在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中日益得到强化。

氏族公共权力在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具有广泛的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页。